

从晋方言看古见系字在细音前腭化的历史

乔全生

(山西大学方言研究中心 太原 030006)

提要 本文根据晋方言古见系字在细音前未腭化与已腭化的现状，讨论了晋方言古见系字开始腭化的时间，通过方言之间的历史比较并结合历史文献，提出了古见系字腭化的时间当始于晚唐五代。

关键词 古见系字 细音 腭化

文中所称“晋方言”，即当今学界“晋语”，不包括山西境内中原官话汾河片。汾河片作为官话与晋方言的过渡区，有的特点与晋方言相近。讨论晋方言见系字腭化的历史多涉及到汾河片。本文运用“方言历史比较法”与“历史文献考证法”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古见系字腭化的时间。

一 古见系字细音前未腭化的现状

晋方言上党片的古见系三四等字，还保留着细音前未腭化的读音。黎城、潞城、平顺、壶关、陵川、阳城、高平等7个方言点见晓组在今细音前读[c]、[c']、[ç]。与精组在细音前已腭化的[tɕ]、[tɕ']、[ç]保持区别。如：

表1

	精精三≠经见四	趣清三≠去溪三	修心三≠休晓三
阳城	ɛtɕiã̃≠ɛciã̃	tɕỹ ³ ≠c'ỹ ³	ɛçiəu≠ɛçiəu
平顺	ɛtɕiŋ≠ɛciŋ	tɕỹ ³ ≠c'ỹ ³	ɛçiəu≠ɛçiəu

山西境内中原官话汾河片的部分方言也显示这一特点。吉县、临猗、运城、平陆、芮城、河津等点，古见系字蟹摄开口二等字保留[k]、[x]的读音（因溪母无字，故无[k']）。如：

表2

	街	界	解解开	芥	戒猪八戒	鞋	蟹	解姓
吉县	ɛkai	kai ³	ɿkai	kai ³	kai ³	ɛxai	xai ³	xai ³
临猗	ɛkai	kai ³	ɿkai	kai ³	kai ³	ɛxai	xai ³	xai ³

汾河片万荣话、河津话读“起”为[k'ei]，“早起”为“早[k'ei]”，“起来”为“[k'ei]来”。

并州片多数方言溪母字“去”白读读[k'ə³]，见系二等晓匣母白读字读[x]声母，如：介休话：下夏吓[xa³⁵]、鞋[xei¹³]、孝[xou³⁵]、解[xei³⁵]、咸[xæ¹³]、匣[xɿ⁴²³]、辖瞎[xɿ¹³]。

五台片、大包片的古见系二等字已经腭化为[tɕ]、[tɕ']、[ç]，这点与北京官话无别。

二 晋方言见系字未腭化的文献记载

元代的实际读音中见组字有的已腭化，见于著录的未腭化记载太少。元曲山西籍石君宝的《秋胡戏妻》，明藏晋叔文中注音尖团分明，团音：行：霞浪切，夯音亨。

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卷四记载：“又如‘去’字，山西人为‘库’，山东人为‘趋’，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去声，湖广人为‘处’。”山西与南京同为未腭化的[k]声母。

道光年间杨延亮编纂刊行的《赵城县志》卷十八《风俗附方言》记载：“身倦曰乖。”“倦”是山摄合口三等群母字，今赵城方言读[ɛkuai]；“嫁曰改。”“嫁”是假摄开口二等见母字，今赵城、霍州、石楼、隰县、汾西、临汾、洪洞、新绛等方言读[ɛkai]、[ɛkei]。保留了见组字读舌根音的读法。

又载：“杏之为恨也。”杨延亮不是当地人，可能所记音为近似音，这一条记载声母是准确的，但韵母不准，今赵城话读“杏”为[xe]去声。保留舌根擦音。

光绪九年（1884）重修的《文水县志》卷三《方言》记载：“不解曰解（音害）不下。”1917年修纂的《临县志》卷十三《风土方言》也记载：“不懂曰解不下（解读若亥）。”

1920年修纂的《虞乡县志》卷四《方言略》记载：筋读作根。筋是见母字，保留了舌根音读法。

1929年修纂的《新绛县志》卷一《方言略》用注音字母记载：瞎辖读[xa]，鞋读[xai]。

三 晋方言古见系字开始腭化的时间

今晋方言尽管保留有古见系字未腭化的现象，历史文献中也有有关晋方言古见系字未腭化的记载，然而，晋方言中古见系字腭化的时间却是比较早的。从古文献与今方言两方面看，晋方言古见系字开始腭化的时间似可上推至唐五代。

罗常培推测，四种文献只有《大乘中宗见解》以牙音 k'yiin 对译穿母“称”字，已然露出溪母腭化的痕迹，为牙音腭化的肇端。（1961：162，22）我们的体会是：牙音注读半腭化的穿母 c'，说明牙音也读半腭化的 c'，已走出腭化的第一步。这可视为见组开始腭化的最早记载。邵荣芬认为，在敦煌俗文学中有一些精系、知系和见系相代的例子，“不能凭一两个例子就断言当时见系字已经腭化。何况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我们也没有发现见等真正腭化的方言，就更不能鲁莽了。”（1963）

在唐五代见系有没有腭化这个问题上，罗常培先生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正确与否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虽然只有“一两个例子”，关键看它是不是事实；第二，能否得到今方言的支持。第一点无疑是事实，因为邵荣芬先生也发现有“一些”互代的例子。第二点很重要，但罗先生当时没有举出相关方言。我们发现晋方言中有见系字早期腭化的现象。现提出来讨论。

晋方言吕梁片（并州片也有，如平遥、榆次等）有大量山摄开口一等见系字和个别蟹摄开口一等见系字与二三四等韵一起读细音的现象，如吕梁片临县、中阳，陕北清涧、并州片榆次等。读细音后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一等见溪影母字在细音前不腭化，如临县、中阳：干肝泔甘[_ɿkʰiɛ]、敢竿杆赶擗[_ɿkʰiɛ]、砍[_ɿkʰiɛ]、看[kʰiɛ^ɿ]；榆次话读[iɛ]韵母。二是一等晓匣疑母字在细音前腭化，如临县、中阳：憨[_ɿɕiɛ]、寒[_ɿɕiɛ]、汉汗馱旱[_ɿɕiɛ^ɿ]、岸[niɛ^ɿ]，清涧：孩[_ɿɕi]（刘勋宁 1994），中阳：“小孩”叫“孩孩”[_ɿɕiɛ _ɿɕiɛ]（胡福汝 1990：38）临县“小孩儿”叫“戏儿”[_ɿɕiɛ⁵³]（李小平 1991：42，乔按：临县话的阳平单字调 44，儿化以后读同去声调 53，如：牙儿[niɛ⁴⁴⁻⁵³]牛儿[niɛ⁴⁴⁻⁵³]见李小平 1991：14），比照清涧话，其本字当为“孩”。与二等晓匣疑母字在细音前腭化相同。结合上述两种情况可将见系字腭化情况用规则描写于下：

规则 1 （见溪一等字）k、k' → k、k' / __ i

规则 2 （见溪二等字）k、k' → tɕ、tɕ' / __ i

规则 3 （晓匣一二等字）x → ɕ / __ i

规则 4 （见系三四等字）k、k'、x → tɕ、tɕ'、ɕ / __ i

规则 1 表示见溪一等字在细音前不腭化，规则 2 表示见溪二等字在细音前已腭化；规则 3 表示晓匣母一二等字“憨寒汉汗馱旱、孩”的声母在细音前均由[x]腭化为[ɕ]。由以上规则可假设：（1）二等字腭化比一等字快。（2）三四等腭化比一和二等快。（3）晓匣母一二等腭化比见溪母一等快。一般说来，见系一等腭化的时间只能晚于二等，如果能获悉晓匣母一等腭化的时间也就能大致推出二等腭化的时间。那么，中阳、临县、清涧见系一等字“寒汗孩”的声母何时由[x]腭化为[ɕ]的呢？这就必须找到方言和历史两个参照点。

一等字的“孩”在清涧、临县等地读腭化音[_ɿɕi]/[_ɿɕiɛ^ɿ]，而在今洪洞一带读[_ɿsɿ]，男孩义，俗作“厮”。我们认为，[_ɿsɿ]的前身应当是[_ɿɕi]，[_ɿsɿ]是[_ɿɕi]元音高化的结果，元音高化在晋方言是一种普遍现象。今洪洞、孝义等方言将男孩儿分别叫[_ɿsɿr]、[_ɿsər]。但“厮”绝非“男孩”的本字。《玉篇》：“厮，贱也。”《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陈立疏：“其实厮为贱役之通称。”近代汉语中的“这厮、那厮”即为此义。又引申为“役使”义。《广雅·释诂一》：“厮，使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厮征伯侨

役羨门兮，属岐伯使尚方。”《广韵》：“厮，厮养也，役也，使也。”小韵“斯，息移切。”至近代汉语中或多用为“相[ɛsɿ]”的同音替代字。韵书中的“厮”多表“使役、贱”义，没有指“男孩”的义项，且声调亦不合，前者读阴平，后者读阳平。足见读阳平的“厮”是某字的同音替代字。表男孩的“厮”应是后起的表音字。故与早期表使役的“厮”声调不合。

根据晋方言语音演变规律，[ɿ]韵母的来源只能有两个：一是源于止开三的精组、知系字，二是源于止蟹摄的见系字。既然精组字的“厮”与“男孩”之间没有意义上的联系，且精组、知系也没有表示男孩的其他字，那就只能考虑源于见晓组。见组无读[sɿ]的条件，只能将目光投向晓组，止蟹摄三四等字晋方言中部可读为[sɿ]，但所辖字也均与男孩义无涉。剩下只有蟹摄一二等。查今晋方言，清涧、临县等方言中的蟹摄匣母开口一等字“孩”可读[ɛci]，根据这条线索，读“孩”为[ɛci]与“男孩”叫[ɛsɿ]有语音上的联系，[ɿ]韵母应当是舌面元音[i]继续高化变成舌尖元音的结果，舌面前清擦音声母[c]也随着舌面元音[i]高化为[ɿ]而相应变为舌尖前清擦音声母[s]以达和谐。[ɛci]演变为[ɛsɿ]符合语音演变规律。今晋方言并州片方言这种变化不胜枚举，如祁县、汾阳、太谷、寿阳等。可以说，洪洞、孝义话表“男孩”的[ɛsɿr]、[ɛsɛr]当是由清涧、临县话表“孩儿”的[ciar⁵³]元音高化后演变成的读音。“厮”的本字原来正是常挂嘴边的“孩”字。语音上建立起联系后再看意义上是否相合。临县、清涧的“孩儿”是统指，包括男孩儿和女孩儿；洪洞、孝义的“厮儿”是单指，只指男孩儿。二字所指的语义范围不同。其实，在山西方言中，表示“孩子”一类的词，在某一方言是统指，在另一方言却可以单指。如：“孩子（儿）”一词，在介休等方言中是统指，包括“男孩和女孩”，在临猗方言中则是单指，只指“男孩”。“娃子”一词在新绛方言统指男孩和女孩，但在户县方言单指男孩；“娃”一词在临汾方言中统指男孩和女孩，但在运城方言中则单指男孩。因此，清涧、临县话的统指到了洪洞、孝义等方言成为单指并非孤立现象。因此，[ɛsɿ]与[ɛci]的对应是成立的，[ɛsɿ]源于[ɛci]，“厮”就是“孩”，不可能是其他。今晋方言有多个方言点将男孩叫“小子”，文水话一点读音为“[ɿci]子”，（胡双宝 1990，75）那么，“厮”会不会是源于“小”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1）文水话效摄字今全读[ci]，别的方言不读[ci]韵，只读开口韵。找不到旁证。（2）由于文水话效摄今读细音的韵母单化高化后占据了高元音[i]的位置，那么，止蟹摄三等字只好继续高化变为[ɿ]韵母。[i]与[ɿ]在文水话是对立的。因此文水的[i]不可能发展为别的方言的[ɿ]。（3）“小子”一词在上古指“子弟或年幼的一辈”，如：《诗·大雅·思齐》：“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到了清代才有指男孩的用法。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这种用法已接近于现代方言用法。（4）“厮”是阳平，“小”是上声，声调不合。以上四点说明“厮”与“小”尽管意义上相同，但语音上缺乏联系。

那么，“厮”是如何从“孩”的读音演变过来的呢？如上所述，由吕梁片的清涧、临县见系匣母一等字细音前读[c]声母推及洪洞、孝义见系匣母一等字读[s-]声母，故[ɛsɿ]的前身是[ɛci]，[ɛci]是匣母一等字读细音后颞化的结果，故[ɛci]的前身定然是[ɛxi]，[ɛci]成了上连[ɛxi]、下接[ɛsɿ]的桥梁。[ɛxi]的前身是[ɛxɛ]（文水、武乡）、[ɛxɛ]的前身是[ɛxɛɛ]（天镇）、[ɛxei]（平遥），[ɛxɛɛ]、[ɛxei]的前身是[ɛxai]。“孩”到“厮”的演变顺序如下：

*xɔi → ɛxai → ɛxɛɛ、ɛxei → ɛxɛ → ɛxi → ɛci → ɛsɿ

除了[ɛxi]一个环节没有找到活的方言之外，其他读音今晋方言均有。反映了“孩”演变为“厮”的全过程。

有了方言参照点，再看历史参照点。

元曲多有“厮儿”表“男孩儿”的用例。如：

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369：“请来凭脉，他道小梅行必定是个厮儿胎。”又见“若是个女儿呵，罢论，若是个小厮儿呵，耻辱那老子一场。”又368：“我想来，若是得个女儿也，则分的他一半儿家私，若是得一个小厮儿，我两只手交付与他那家私，我不干生受了一

场。”“小厮儿”与“女儿”对举，“小厮儿”显然指男孩儿。

纪君祥《赵氏孤儿》1478：“（旦儿云）今日所生一子，记的驸马临亡之时，曾有遗言，若是添个小厮儿，唤作赵氏孤儿，待他久后成人长大，与父母雪冤报仇。”“子”与“小厮儿”对举。“小厮儿”指男孩儿。又1482：“（屠岸贾云）我如今不免诈传灵公的命，把普国内但是半岁以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厮，都与我刷将来，见一个剁三剑，其中必然有赵氏孤儿，可不除了我这腹心之害？”又1494：“（程婴云）其时公主腹怀有孕，赵朔遗言，我若死后，你添的个小厮儿呵，可名赵氏孤儿，与俺三百口报仇。”

李寿卿《伍员吹箫》655：“（閻丘亮云）我有一子，却是个村厮儿，你久后得志，休忘了此子。”“子”与“厮儿”对举，“厮儿”指男孩儿。

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125：“（旦儿云）若是擲个上上大吉，便是小厮儿；擲个中平，便是女儿；若是擲个不合神道，便是鬼胎。”也是“小厮儿”与“女儿”对举，“小厮儿”指男孩儿。

李行道《包待制智赚灰栏记》1109：“（搽旦云）俺员外取得一个妇人，叫做什么张海棠，他跟前添了个小厮儿，长成五岁了也。”“小厮儿”指男孩儿。

杨文奎《翠红乡儿女两团圆》461：“（王兽医云）我可与你个小厮儿。（旦儿云）你哪里将来？（王兽医云）姐姐你休问他。若是姐夫来家，则说是你添的。（旦儿云）好、好，兄弟也，你将这女儿，或是丢在河里井里，凭你将的去。”又466：“（王兽医云）我问他得了个儿也是女，他便道：得了个小厮儿。”“小厮儿”指男孩儿。

《庞居士误放来生债》306：“（卜儿云）居士，你寻思波，俺女儿不曾嫁，小厮儿不曾娶，你投至的这个家业，非一日之故。”“小厮儿”与“女儿”对举。“小厮儿”也是指男孩儿。

王实甫《西厢记·楔子》：“（老夫人云）又有个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作红娘。一个小厮儿，唤作欢郎。”“小厮儿”与“小妮子”对举。“小厮儿”也是指男孩儿。

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842：“（李四云）一双儿女，厮儿叫做喜童，女儿叫做娇儿。”“厮儿”与“女儿”对举。“厮儿”当指男孩儿。

以上不惜笔墨列举了元曲中的大量用例，旨在说明“厮”指“男孩儿”，“厮”就是“孩”的本字。元曲道白中表男孩的“厮”与晋方言表男孩的“厮”表义完全相同。

元杂剧道白虽有被明人改动之嫌，但并非概不反映元代语言的特点，故也有持不同意见者。退一步说，即使在明代语言中已有将“孩”读[$\text{ɛ}\text{s}\text{ɿ}$]的现象（因元明时期的支思韵早已完成），那么它的前身[$\text{ɛ}\text{ci}$]应当是一个比明代、元代更早的音，否则没有足够的时间由[$\text{ɛ}\text{ci}$]演变到[$\text{ɛ}\text{s}\text{ɿ}$]。任何实际语音的演变往往早于见于著录的时间，且其演变往往是甚为缓慢的，[$\text{ɛ}\text{ci}$]演变为[$\text{ɛ}\text{s}\text{ɿ}$]也应当经一个缓慢的历程。因此，元明时期即已存在的[$\text{ɛ}\text{s}\text{ɿ}$]，其前身[$\text{ɛ}\text{ci}$]就应当是一个宋甚至宋之前的读音，无论洪洞、孝义的[$\text{ɛ}\text{s}\text{ɿ}\text{r}$]、[$\text{ɛ}\text{s}\text{ɔ}\text{r}$]是当地方言的直接演变还是由别的方言借用而来，这个变化的历程均是相当长的。那么，将一等字已经腭化为[$\text{ɛ}\text{ci}$]的时间定为宋代并不为过。一般说来，一等腭化的时代应该晚于或等于二等腭化的时代，已经腭化的时代往往也晚于开始出现腭化的时代。因此，从晋方言诸方言点看，见系开始腭化的时间还应当更早。

表“男孩”的“厮”既然在元曲中多见，下面我们试用 A、B、C 三个阶段来推测见系腭化的时间。假定元明时读[$\text{ɛ}\text{s}\text{ɿ}$]（元代支思韵已经产生）是 A 阶段的读音，那么读[$\text{ɛ}\text{ci}$]就应是早于元明的 B 阶段的语音形式，即宋元时的读音了。否则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变为高化音。似可认为，一等字“孩”腭化为[$\text{ɛ}\text{ci}$]是接近 B 阶段（宋元时）的读音，类推下来二等字、三四等字腭化则应是早于 B 阶段（宋元的读音），接近 A 阶段读音（相当于罗常培所说的晚唐）了。下面试列“厮”的读音向上溯源见系腭化图：

方言点	今方音	A 阶段	B 阶段	C 阶段
-----	-----	------	------	------

临县、清涧 ɕi (一等) ——— ɕi (一等) ——— ɕi (一等) — ɕi (二等)
 洪洞 sɿ (一等) ——— sɿ (一等) — ɿ

晋方言腭化演变过程显示,可能比一般认为的腭化开始于宋元时期还要提前。回头看罗常培认为的见系字在唐五代西北方音即已有腭化肇端的论断,很可能并非“鲁莽”之言。既然晋方言一等韵腭化得相当早,有可能在C阶段,那么二三四等韵的腭化则不应晚于C阶段。罗先生所举“称”是二等韵,自然包括在内。古见组字腭化,发端于唐五代,形成于宋,再高化于元明应是自然的演进过程。晋方言见系腭化演变实例和过程或许会对罗先生论断提供一点方言支持。

从见系“超前腭化”的现象也可以旁证见系腭化是比较早的现象,否则没有足够时间由[k]、[kʰ]、[x]变为[tɕ]、[tɕʰ]、[ɕ],再由[tɕ]、[tɕʰ]变为[t]、[tʰ]和[tɕ]、[tɕʰ]。山西中原官话汾河片多数方言点见溪母白读为[t]、[tʰ]或[tɕ]、[tɕʰ]。列举如下:

洪洞话:肩[ɿtian]、见[tian^ɿ]、牵[ɿʰian]、轻[ɿʰie]、觉[ɿtio]等。

万荣话:家甲[ɿʂa]、嫁[tɕa^ɿ]、觉[ɿʂy]、紧[ɿʂei]、劲[tɕei^ɿ]、教胶[ɿʂao]、敲[ɿʂ'ao]等。

从发音原理看,这种演变不是由舌面后音[k]直接演变为舌尖中音[t]、舌尖后音[tɕ],而是先腭化演变为舌面前音[tɕ]以后,又继续向前腭化演变的结果,即:k、kʰ——tɕ、tɕʰ——t、tʰ / tɕ、tɕʰ,这种演变方式,我们称其为“腭化后的超前演变”。这种塞音“腭化后超前演变”,擦音只腭化没超前演变的形式,在汉语方言里都是比较特殊的。

十七世纪山西文士傅山的《霜红龕集》谈到太原话古见母三等字“九”与古精母三等字“酒”,古见母四等字“见”与古精母三等字“箭”腭化后声母读音相同。说明太原是大都市尖团区别消失得快。

就整个晋方言看,难以断定古见系字腭化何时完成,因为各片之间古见系字腭化极不平衡,快慢不一,有的片见系一二等字早在晚唐五代即已出现腭化兆头;有的片至今见母三四等字也未腭化。

可见,古见系字的腭化从发生到完成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宁忌浮先生指出:“舌根音的舌面化,早在宋金元间就发生了。”(1997)是指官话的上限,王力先生说到乾隆八年完全不分是指官话的下限。晋方言古见系字腭化的时间上下限与官话区多有不同。

主要参考文献:

- [1] 陆 容.菽园杂记[M].十五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 [2] 藏晋叔.元曲选[M].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
- [3] 傅 山.霜红龕集[M].四十卷.宣统三年(1911年)山阳丁氏刊本.
- [4] 杨延亮纂修.赵城县志[M].道光年间刊行.
- [5] 范啟堃.王 炜修.阴步霞纂.文水县志[M].光绪九年(1883年)修.
- [6] 胡宗虞.吴命新修.临县志[M].1917年修.
- [7] 徐黄之.同振声等修.李 抚.李林蔚等纂.虞乡县志[M].1920年修.
- [8] 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新绛县志[M].1929年修.
- [9] 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0] 李小平.临县方言志[M].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 [11] 刘勋宁.陕北清涧话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语尾[-mi]探源[A].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C].第二辑.史语所集刊论文集之二.1994.
- [12]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又见1933年史语所集刊甲种之十二.
- [13] 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4] 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J].中国语文.1963,(3).
- [15] 胡双宝.文水方言志[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

